

交流画版 风尘录

■ 李 平 凡

■ 四川 美 术 出 版 社



李
平
凡

版
画
交
流
风
尘
录

四
川
美
术
出
版
社

版画交流风尘录

李平凡

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乐山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3.75

插页14 字数79千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7-5410-0188-0/J.183

定价：2.20元

前 言

这本回忆录——《版画交流风尘录》，是我的日本老朋友久保茂离世之前希望我写的，时在1980年。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拖到1983年才匆匆命笔，并由另一位日本友人小野田耕三郎翻译，在日本《记录》月刊上分期刊载。

目前付印的中文本，即是在日文本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的。

鲁迅先生倡导中国新兴版画运动，非常重视国际版画交流工作，开创了我国与欧洲、日本等国版画交流的新历史，同时促进了我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版画友好交流蓬勃发展，日本一度出现了“中国版画热”。“四人帮”横行期，中日版画交流关系被迫中断。但从1979年开始，中日版画交流不仅得到恢复，而且进入一个发展的新时期，令人深感快慰。

这本回忆录，并非较完整的中日现代版画交流的史料集，仅仅是个人40年来交流工作的部分记录。为了使读者进

一步了解中国版画在日本展览时的反映，在本书最后附录了日本各界观众对中国版画的观感，谨供参考。

李平凡

1987年5月于北京

致中国读者

《版画交流风尘录》日本文版，连载于日本东京出版的《记录》月刊，是小野田耕三郎翻译的。3年之后，欣闻四川美术出版社将出版中文本，我和朋友们都感到十分欣喜。

日中两国民间版画的友好交流有千年以上的历史。50多年前，鲁迅先生倡导中国新兴版画运动，聘日本友人内山嘉吉担任上海木刻讲习会讲师，由此开始了日中两国版画交流的新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平凡先生扩建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强令解散的日本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创办中日文版《版画文化》报，成立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日本联络站，与日本版画社团和版画家们共同推进日中版画友好交流事业，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

今年，是李平凡先生学习和从事版画事业50周年，又是在日本介绍中国版画40周年，日本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委托日中艺术研究会，在东京中国大使馆举办了授奖仪式，授予李平凡画业50周年纪念金奖和版画交流特别功劳奖杯，表彰李平凡先生的业绩。

这册回忆录，不仅真实地反映了40年来日中版画交流的

第一手史料，而作者同时赞颂了日中两国人民和版画家之间的友好情谊，这种情谊是我们要加以继承、珍惜和发扬下去的。

我们衷心祝愿日中版画的友好交流不断繁荣，取得更大成就。

荻长爱子

1687年5月于东京

目 录

前言	(1)
致中国读者(日本·荻长爱子)	(3)
难忘的一九四三年	(1)
华侨版画团体的初建和解体	(4)
护建华侨版画团体	(7)
访内山嘉吉	(10)
中日文版《版画文化》报	(14)
中国初期创作版画展	(17)
日文版《中国初期木刻集》	(21)
怀念尾崎清次	(24)
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日本联络站	(28)
我的老师川西英	(31)
东京中国木刻恳亲会	(34)
全日本新木刻运动会议	(37)
全日本新木刻运动大会祝词	(40)
日本的中国版画热	(42)
日本版画运动协会	(45)

日本版《中华人民版画集》	(48)
内山完造与中国新兴版画运动	(51)
为版画交流作出贡献的日本朋友	(54)
筹备新中国日本版画展	(66)
向日本告别	(68)
所谓“台北中央社特电”	(70)
中国首次日本版画展	(73)
在祖国大地上的中日版画交流	(76)
中日版画交流的新时代	(79)
附录：日本观众对中国版画的观感	(86)
图版目录（附图版）	(109)

难忘的1943年

在我平凡而又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给我留下最深记忆的，是四十多年前首次东渡日本的1943年。

先简略交代一下1943年前我个人的缩影。

1922年5月13日，我和双胞胎的妹妹，降生在天津一个封建世家。这个家，颇有点象巴金小说所写的《家》。17岁时，我毅然背叛了这个家庭，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脱离这个所谓“四世同堂”之家的导火线，是我的一位伯父偷看了我的日记。在日记里，我写下了对这个家庭的愤慨与仇视——它是如何披着“乡绅”的外衣，又是如何欺压农民过着寄生生活的。伯父勃然大怒，指斥我是不孝子孙、家庭叛逆。我与伯父针锋相对，历数这个家庭的丑恶，然后弃家出走。

回忆起来，背叛这个封建之家并非偶然。这和我学习木刻，读过某些进步书刊，以及崇敬鲁迅是有关的。

1937年“七七事变”，我失学一年，开始自学木刻。我的堂兄李文珍，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在北平艺专读书时，受当时爱国运动影响，刻过不少木刻。失

学的这一年，我拿起了他留下的木版和刀具。当时有两本画册作为范本——鲁迅编序的《一个人的受难》（麦绥莱勒刻）和《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为我自学打开了视野。此外，在校复学之后，几位要好的同学互相交换阅读一些当时的“禁书”，逐渐形成了一个自发性的地下读书会。最吸引我的两本书是：美国新闻记者斯诺著《西行漫记》，和艾思奇著《大众哲学》。在交流读书心得时，使我逐渐认识到我出身的家庭，完全是剥削农民血汗而作威作福的丑恶之家。

1943年上半年，在东渡日本之前，我原是河北省乐亭初级中学的美术教师，曾秘密与城外的八路军武工队有过联系。校长担心我会给学校引来大祸，在学期结束时我便被校方解聘，而面临一个最严重的个人问题——失业。料不到这年夏天，日本神户华侨学校在国内招聘教师，经人介绍，我被侨校校长李万之录取，由此开始了我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

作为一名青年木刻工作者，当时留给祖国唯一的版画纪念品，是我1942年自刻自印的二百册限定本《平凡木刻版画》（第一辑）。在前言里我写过这样一些话：

如果对这本小集说几句话，那就是：

这是名副其实的平凡版画。这里没有生活的欢乐和欣慰，而是真实的生活和现实社会的面影——饥饿的人群、失业者，疲劳不堪的农民和农妇，街头巷尾的乞儿……。我的信念只有一条：版画艺术不是为了粉饰我所生活的这个社会。

这本版画小集的封面，是我一幅自刻像，题目是《平凡在黑暗中》，有意把自己刻成猫似的眼睛，用以勉励自己要像猫那样能在黑暗中观察我所生活的社会。

华侨版画团体的初建和解体

我与七位侨校新教师乘当时“大陆通车”，自北京经伪满州国和朝鲜半岛，过海峡到达日本。旅途十分辛苦。一路上，我反复考虑今后工作和生活的计划。

侨校第一次开展版画教学课后，习作在校园展览栏里展出，同学间互换印制的木刻画，引起了同学们的浓厚兴趣。侨校高中部同学中，以张俊发为首，很快组成木刻班，教学工作十分顺利。最令人高兴的是，老华侨中有版画爱好者，在业余也刻过木刻。此外，教师中也有对版画发生兴趣的。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国内严厉镇压进步人士和民主活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地。侨校有日本反动政府指派的所谓“日本顾问”，多方监视学校。而日本特高警察，常到侨校探头探脑，问长问短。当时没有自由结社的可能。但是，为了发展华侨版画事业，我们秘密地组成“神户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互相勉励学习，为华侨版画运动积蓄力量。

不久，会员中的兰蔚邦老先生因长期失业，只得计划回祖国家乡去觅职糊口。为了纪念我们之间的版画友谊，像浮萍草那样在海外相逢而又离去，决定印制《浮萍集》作为纪

念。想不到被侨校日本顾问暗中发现和告密，《浮萍集》作者和其他会员，在同一天遭到日本特高警察的查抄。

记得那天早上8点半左右，李校长紧张地赶来我的教室，告诉我日本兵库县特高头目鸿山俊雄（这个人我一生不会忘记），带领5名便衣要讯问我和查抄宿舍。

鸿山俊雄其人，会讲北京话、广东话和上海话，是常到侨校走门串户的家伙，也是侨界共知的坏人。侨生赵重裕的哥哥，对日本政府有不满情绪，即遭他的毒手而死去。

这次抄家十分仔细，从上午到下午，连精装本画册的书脊和弹簧椅子都割开搜查。鸿山代表日本官方宣布，我与某一“大案”有关。嗣后我听人讲，这次抄家，惊动了侨界，校长和侨校董事会十分紧张，向日本政府进行对我的救助活动。

鸿山佯称他尊敬鲁迅，向我提出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完全暴露了他的愚蠢和不学无术。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和鲁迅是什么时候见面的？”我告他：鲁迅病逝于1936年，其时我只14岁，他在上海，我在天津，怎么会见面？鸿山又拿着我的木刻一一提问：为什么要刻穷人，为什么要刻失业者和饥饿的人群？我告诉他：家母信奉佛教，自幼教育我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我基于人道立场，同情他们。

抄家的特高，没有获得所谓与“大案”有关的任何证据。但贼不走空，便没收了所有的《浮萍集》，同时宣布强令解散版画团体，不能再有任何活动。自此以后，我已处在日本特高的监视之下，失去了一般外侨的人身自由。有几次我在住区的街道和公园散步，突然遭到搜查。这类情况直到

日本帝国主义政府战败投降。我几次要求回国探亲，均以“案件未了”而被拒绝。我深知鸿山之流，不过是日本反动势力的小丑和爪牙，他绝对不能代表日本人民。当时我在沉默中开始研究版画史，但在内心深处却在期待着日本的黎明。

扩建华侨版画团体

日本华侨第一个版画团体被强令解体之后，我完全投身于学习和研究版画史的工作，编写了《鲁迅与木刻运动年表》、《版画史年表》。日本研究家黑田源次、禿氏祐祥、石田干之助、长泽规矩也、水谷弓彦、藤悬静也，永见德太郎等等的著作，使我获益不少。特别是我认真阅读了日本改造社出版的《大鲁迅全集》，使我更加崇敬鲁迅先生。

此外，我也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日本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1945年6月6日，美国飞机对神户市的一次大空袭，使侨校和全市一同化为灰烬，我也和日本神户市民一样成为战争罹灾者。

“八·一五”日本投降。战后日本人民的悲惨处境——苦难、失业、饥饿、病疫、妻离子散……这一切都使我记忆犹新。也因此使我对侵略战争、霸权主义、民族压迫与法西斯主义深痛恶绝，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反对霸权主义和保卫和平的强烈信念。在我内心深处衷心期待中日两国人民，应当世代代和平共处、友好下去。我深信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定会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此时此刻，我们

感到恢复和扩建华侨版画团体的时机已经到来。经过20多天的串联，神户、京都、名古屋、东京和横滨的华侨版画爱好者，终于在当年9月15日正式宣布组成“日本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并发表了宣言。在宣言中有这样的话：

“我们的力量是微小的，但是我们却有坚强的信念。为了发扬祖国新兴版画运动，希望这支海外支流和祖国版画家一起，继承鲁迅遗志，做些负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决心以集体力量和祖国人民的生活和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故命名为新集体版画协会。”

这个团体的宗旨是：在华侨中普及版画教育工作，积极与祖国版画组织和日本进步版画界取得联系，促进中日版画的友好交流，把鲁迅与内山嘉吉开创的友好交流关系，重新发展起来。新集体版协下设四个部门：联络部，负责国内外联系；出版部，负责出版会报和编选版画集；展览部，负责筹备展览活动；资料研究部，负责收集版画资料进行研究。当时在协会里积极工作的有尹维业、曾广仁、鲍垣、周燕丽、郑丽娟、詹永年、招瑞娟、陈莲好和日本朋友林宁寿、佐佐木敬。1947年下半年，为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版画的交流，我们聘请尾崎清次先生作为协会的特邀顾问。当时这个团体的成员，完全是义务性的自觉工作。我本人为筹备协会的经费，兼任大阪国际新闻社整理部长、美术编辑，和神户外语大学讲师，所有收入，全部献给协会。但是活动经费仍处在困境之中。